

# 宗炳出仕考

韦 宾

---

刘宋时期的思想家、画家宗炳在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，但《宋书·宗炳传》有关其人的记载比较含糊，后世也有不少误读。结合《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弘明集》等相关文献记载，可以相对确定其一生主要活动时间及相关活动内容。宗炳至少在青年时期担任过殷仲堪、桓玄所辟的主簿之职，中年时期曾长期担任刘宋太子舍人之职，其一生有相当长的出仕经历。晚唐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误读《宋书·宗炳传》，并有意篡改相关史实，将宗炳塑造成一位“前后辟召，竟不就”的从未涉足官场的隐士，致使后世学者形成宗炳一生从未出仕的印象，这其实是个误解。

---

宗炳是刘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画家<sup>①</sup>。在思想上，他深受名僧慧远的影响。《明佛论》是他根据慧远的思想写的一篇论述神不灭的长文，在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。他的另外一篇短文《画山水序》写作时间与《明佛论》大致相仿，从佛教角度对山水之乐和山水画的表现方法与旨趣作了深刻的论述。这篇短文在中国画论史上有着重要意义，直到今天，对于山水画理论与创作仍有很多借鉴。宗炳本人也因为这篇短文，确立了他在美术史上的地位。《宋书·宗炳传》对有些问题记载得比较含糊，关于他的生平后人了解很少，尤其对他是否出仕甚至存在一些误解。本文主要对宗炳活动时间及出仕等问题作初步考察。按《宋书》卷九十三宗炳传，宗炳生于公元375年。其本传之内容，散入以下文中<sup>②</sup>。

本传谓：“宗炳字少文，南阳涅阳人也。祖承，宜都太守。父繇之，湘乡令。母同郡师氏，聪辩有学义，教授诸子。炳居丧过礼，为乡闾所称。刺史殷仲堪、桓玄并辟主簿，举秀才，不就。”时宗炳约二十五岁。可能就主簿之职，而不就秀才之举。见下引王敬弘传内容。按《晋书》帝纪第九，太元十七年“十一月癸酉，以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益梁三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”<sup>③</sup>，知宗炳为辟主簿，举秀才不就事当在太元十七年十一月之后，即392年冬之后。按后，此句当断为

“并辟主簿，举秀才不就”即言宗炳就主簿之职，而举秀才不就。并辟者，疑桓玄已用事。按《晋书》列传第六十九桓玄本传及《晋书》帝纪第十，可知隆安二年，桓玄因王国宝事始得志，为广州刺史而仍留荆州。隆安三年，桓玄袭殷仲堪而害之，而后表求领江、荆二州。又按此前则加诏桓玄为都督荆州四郡，则知若“刺史殷仲堪、桓玄并辟主簿，举秀才不就”为“共辟”，其事当在隆安二年与三年之间，即398—399年之间，时宗炳约二十五岁。

## 二

本传谓：“高祖诛刘毅，领荆州，问毅府咨议参军申永曰：‘今日何施而可？’永曰：‘除其宿衅，倍其惠泽，贯叙门次，显擢才能，如此而已。’高祖纳之，辟炳为主簿，不起。问其故，答曰：‘棲丘饮谷，三十余年。’高祖善其对。”按《晋书》帝纪第十，义熙八年（412）刘裕陷江陵，刘毅自杀，则高祖辟宗炳主簿当在其后，即义熙八年九月之后，其时宗炳三十八岁。疑仍在荆州。

本传谓：“妙善琴书，精于言理，每游山水，往辄忘归。征西长史王敬弘每从之，未尝不弥日也。”其时宗炳当为三十七八岁。时宗炳已任桓玄与殷仲堪，或刘裕所辟之主簿职。按《宋书》列传二十六王敬弘传：“时府主簿宗协亦有高趣，道规并以事外相期。”<sup>④</sup>“宗协”应为宗炳。《宋书》王敬弘传，并无“征西长史”之职。则其时宗炳已任桓玄与殷仲堪或刘裕所辟之主簿职，时宗炳三十七八岁。

## 三

本传谓：“乃下入庐山，就释慧远考寻文义。兄臧为南平太守，逼与俱还，乃于江陵三湖立宅，闲居无事。”按宗炳《明佛论》，知宗炳在庐山就慧远游在411年、412—416年最为集中。其前或间有来往亦未可知。慧远死于416年，则宗炳从慧远游，在其三十七至四十二岁之间。慧远死后，其兄逼还，而立宅于江陵。寻此文义，则此前宗炳似不必在江陵。

《弘明集》卷二宗炳《明佛论》：“昔远和尚澄业庐山，余往憩五旬。高洁贞厉，理学精妙，固远流也。”按“旬”有两义，一指“一年”，一指“十年”。十年于此逻辑不通，当指一年。知宗炳居庐山时日不多，其他时间或作游览而已。宗炳所修或不在念佛三昧，可与刘遗民比较，事见《广弘明集》慧远《与隐士刘遗民等书》注。按下，“二兄蚤卒，孤累甚多，家贫无以相贍，颇营稼穡。高祖数致饩费，其后子弟从禄，乃悉不复受。高祖开府辟召”云云，则宗炳早年上庐山而为兄逼还事，或在刘宋以前，即420年以前。推测宗炳在慧远晚年至去世期间集中在庐山。其时宗炳约三十七至四十二岁。

本传谓：“高祖召为太尉参军，不就。二兄蚤卒，孤累甚多，家贫无以相贍，颇营稼穡。高祖数致饩费，其后子弟从禄，乃悉不复受。高祖开府辟召，下书曰：‘吾忝大宠，思延贤彦，而《兔置》潜处，《考槃》未臻，侧席丘园，良增虚伫。南阳宗炳、雁门周续之，并植操幽棲，无闷巾褐，可下辟召，以礼屈之。’于是并辟太尉掾，皆不起。”按《宋书》本纪第一、第二及《晋书》帝纪第十，则辟宗炳太尉参军、太尉掾，在义熙七年前后，即411年前后，时宗炳三十七岁左右。

## 四

本传谓：“宋受禅，征为太子舍人。”按为420年，其年宗炳四十六岁。时宗炳可能不在庐山，

然又常往来于荆、庐之间。按《庐山记》卷二《叙山北篇第二》：

次有佛影台。远公《匡山集》云，佛影在西方那伽阿罗国南古仙人石室中，以晋义熙十八年，岁在壬子五月一日，因颺宾禅师、南国律学道士共立此台。拟像本山，因迹以寄诚。虽成由人匠，而功无所加。至于岁在星纪，赤奋若贞，于太阴之墟，九月三日，乃详验别记，铭之于石。孟江州怀玉、王别驾乔之、张常侍野、殷晋安隐、毛黄门修之、宗隐士炳、孟散骑、孟司马（二人名阙）、殷主簿蔚、范孝廉悦之、王参军穆夜等，咸赋铭赞。

文中“义熙十八年，岁在壬子”，“义熙”无十八年，应是“义熙八年”，即412年。又《庐山记》本卷谓：“远公与慧永持、昙顺、昙恒、竺道生、慧叡、道敬、道昺、昙诜，白衣张野、宗炳、刘遗民、张诠、周续之、雷次宗，梵僧佛驮耶舍十八人者，同修净土之法，因号白莲舍十八贤，有传附篇末。”按知炳亦或修净土，此虽非充分可信之证据，然宗炳之信仰净土，或有其实。

本传谓：“元嘉初，又征通直郎。”按下知在元嘉二年，即425年，其时宗炳五十一岁。本传谓：“东宫建，征为太子中舍人，庶子，并不应。”时在宗炳五十一岁后。按《宋书》列传五十三《戴颺传》：

太祖元嘉二年，诏曰：“新除通直散骑侍郎戴颺、太子舍人宗炳，并志托丘园，自求衡华，恬静之操，久而不渝。颺可国子博士，炳可通直散骑侍郎。”东宫初建，又征太子中庶子。十五年，征散骑常侍，并不就。<sup>⑤</sup>

按“新除”者，当即戴、宗已就其职。按前宗炳“宋受禅，征为太子舍人”，即此也。按“东宫建”时为420年。按《宋书》卷三，永初元年（420）秋七月“置东宫冗从仆射、旅賁中郎将官”<sup>⑥</sup>，八月“立王太子为皇太子”<sup>⑦</sup>，“九月壬子朔，置东宫殿中将军十人，员外十二人”<sup>⑧</sup>。又按《弘明集》卷十一何尚之《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》：

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……是时有沙门慧琳，假服僧次而毁其法，著《白黑论》。衡阳太守何承天，与琳比狎，雅相击扬，著《达性论》，并拘滞一方，诋呵释教。永嘉太守颜延之、太子中舍人宗炳，信法者也，检驳二论各万余言。

则宗炳未就通直郎等职，然直至元嘉十二年，宗炳亦为称之“太子舍人”者，即宗炳在其职已十余年。

## 五

本传谓：“妻罗氏，亦有高情，与炳协趣。罗氏没，炳哀之过甚，既而辍哭寻理，悲情顿释。谓沙门释慧坚曰：“死生不分，未易可达，三复至教，方能遣哀。”“慧坚”待考。“既而”者，稍迟也。寻理，寻生死之理，可参考《明佛论》。其时待考。若“慧坚”为慧远，则其时或在416年以前，其事则是宗炳亲近佛教的重要原因。

本传谓：“衡阳王义季在荆州，亲至炳室，与之欢讌，命为咨议参军，不起。”此时宗炳六十五至六十九岁。按《宋书》本纪第五，义季主荆州，在元嘉十六年至元嘉二十一年（439—444）之

间。宗炳元嘉二十年(443)卒于江陵。与义季交往,即在江陵日。此时宗炳六十五至六十九岁。

按《宋书》列传三十三、《宋书》本纪第五,颜延之疾慧琳事或当在此时。宗炳与何承天之论辩,即起于慧琳之《白黑论》。按《宋书》列传二十四何承天传,元嘉七年至十六年间(430—439),何为衡阳内史,此即《答何衡阳书》及《明佛论》所作时也。又按前引《弘明集》卷十一何尚之《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》知,作《明佛论》当在元嘉十二年,即435年,其时何为衡阳内史,而宗炳时年六十一岁。且宗炳可能就任太子舍人一职,此前亦可能就主簿之职。

## 六

本传谓:“好山水,爱远游,西陟荆、巫,南登衡岳,因而结宇衡山,欲怀尚平之志。有疾还江陵,叹曰:‘老疾俱至,名山恐难遍睹,唯当澄怀观道,卧以游之。’凡所游履,皆图之于室,谓人曰:‘抚琴动操,欲令众山皆响。’”宗炳有疾还江陵,而后衡阳王义季在荆州亲至其室,即在元嘉二十年之前,其垂暮之年。

按《画山水序》“余誉恋衡庐,契阔荆巫”,知当在暮年所写。且其文中有可以与《明佛论》互证者,则应作于同一时期。至于“序”是否为原文本名,今无从可考,然不合序体,亦已明矣。然则宗炳寄形乱季,往从庐山,玄悟色空,畅神幽岩,以山水之乐,同于首楞三昧,以应目会理,知貌色同游,开启画禅,应自其人。按《历代名画记》所载,宗炳画有“嵇中散白画、孔子弟子像、狮子击象图、颍川先贤图、永嘉邑屋图、周礼图、惠持师像,并传于代,凡七本”,则当时并非以山水见长,而是以人物画为主。谢赫《画品》谓“炳(明)于六法,迄无适善。而含毫命素,必有损益。迹非准的,意足师仿”,也应是人物画角度来讲的。

本传谓:“古有《金石弄》,为诸桓所重,桓氏亡,其声遂绝,惟炳传焉。太祖遣乐师杨观就炳受之。”太祖宋文帝元嘉元年即位,时424年。则遣杨观受乐,即在424至443年之间,亦宗炳六十至六十九岁之间。则宗炳在六十岁时(或更早)即已有疾还江陵。

本传谓:“炳外弟师觉授亦有素业,以琴书自娱。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,主簿,并不就,乃表荐之,会病卒。”关于师觉授,《南史》卷七十三:

师觉授,字觉授,南阳涅阳人也。与外兄宗少文并有素业,以琴书自娱。于路忽见一人持书一函,题曰“至孝师君苦前”,俄而不见。舍车奔归,闻家哭声,一叫而绝,良久乃苏。后撰《孝子传》八卷。宋临川王义庆辟为州祭酒、主簿,并不就。乃表荐之,会卒。

本传谓:“元嘉二十年,炳卒,时年六十九。衡阳王义季与司徒江夏王义恭书曰:‘宗居士不救所病,其清履肥素,终始可嘉,为之恻怆,不能已已。’子朔,南谯王义宣车骑参军。次绮,江夏王义恭司空主簿。次昭,郢州治中。次说,正员郎。”即宗炳卒于443年,年六十九岁。《宋书》本纪第五,元嘉二十一年二月“己丑,司徒、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尉,领司徒”<sup>⑨</sup>。元嘉二十四年“八月乙未,征北大将军、徐州刺史衡阳王义季薨”<sup>⑩</sup>。义季与义恭书谓:“宗居士不救所病,其清履肥素,终始可嘉,为之恻怆,不能已已。”此句应其“老疾俱至,名山恐难遍睹。唯当澄怀观道,卧以游之”。义季之评宗炳,近于义恭之评雷次宗。按《宋书》卷九十三雷次宗传:

(元嘉)二十五年(雷次宗)卒于钟山,时年六十三。太祖与江夏王义恭书道次宗亡,义恭答曰:“雷次宗不救所疾,甚可痛念。其幽栖穷藪,自宾圣朝,克己复礼,始终若一。伏

惟天慈弘被 亦垂矜愍。”<sup>①</sup>

这些慧远的弟子,在对待生死的态度上,有很一致的地方,显然是深刻的佛教信仰在起作用。按《历代名画记》卷六:

宗炳字少文,南阳涅阳人,善书画。江夏王义恭尝荐炳于宰相,前后辟召,竟不就。善琴书,好山水。西陟荆、巫,南登衡岳,因结宇衡山,怀尚平之志。以疾还江陵,叹曰:“噫,老病俱至,名山恐难遍游,唯当澄怀观道,卧以游之。”

《历代名画记》这段“江夏王义恭尝荐炳于宰相,前后辟召,竟不就”,可能与史实不合。仅就宗炳本传而言,宗炳前后被辟召多次,并非都拒绝。而刘宋时期,宗炳老疾俱至还江陵,所受征召,恐怕指的就是宗炳本传所谓“临川王义庆辟为祭酒,主簿,并不就,乃表荐之,会病卒”。但从《南史》师觉授传来看,这指的是师觉授不应召辟,并非指宗炳,且《宋书》谓召师觉授者为义季,《南史》谓义庆,但与义恭无关。“并不就”乃指祭酒、主簿二职皆不就。就事件本身来讲,师觉授所讲的征辟与《历代名画记》宗炳传所讲的征辟应属同一件事,巧合的可能性很小。《历代名画记》谓刘义恭前后召辟,恐怕是张彦远误读了《宋书·宗炳传》的意思,并且有意将“临川王义庆”改为“江夏王义恭”,且将“辟为祭酒,主簿,并不就”窜改成“前后辟召,竟不就”,以为宗炳一生皆未出仕,实在是一种误解。

因为传世宗炳的文字,主要是论述佛教和隐逸思想的,加之张彦远的误说,很长一段时间,后人对于宗炳,就是认为他是一位著名的隐士,从未做过官<sup>②</sup>。现在看来,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。宗炳做过官,而且不止一次。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多面性,对他们的了解,不应是孤立和片面的。宗炳有过出仕的经历,并不影响对他在文化史上所做贡献的评价。

① 谢赫《画品》第六品:“(宗)炳明于六法,迄无适善。而含毫命素,必有损益。迹非准的,意足师仿。”又《历代名画记》卷六有宗炳传。本文所引《南史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庐山记》、《历代名画记》、《画品》均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②④⑤⑥⑦⑧⑨⑩⑪ 《宋书》卷九十三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2277页,第54页,第55页,第56页,第91页,第95页,第2294页,第1729—1730页。

③ 《晋书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239页。

⑫ 陈传席《六朝画论研究》第141页附“宗炳介绍”宗炳祖上是做官的……但他一直不愿做官,东晋末年,刘毅、刘道怜等先后召用,皆不就。入宋后,朝廷多次征召,皆不应。大约在他二十八岁左右,曾不远千里跑到庐山,在阿弥陀佛像前宣誓死后要往生弥陀净土。并“入庐山,就释慧远考寻文义”。五个月后,因他的哥哥宗臧反对,他下了山。宗臧当时任南平太守,于是就在南平附近的江陵(今湖北江陵)给他“立宅”。他在这里,“闲居无事”。后来,“二兄蚤卒,孤累甚多”,他的生活发生了困难,“家贫无以相贍,颇营稼穡”,但仍不去做官。(参见陈传席《六朝画论研究》,台北: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)

(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)

责任编辑 陈诗红